

目 录

- 12
- (1) 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
委员会关于文史资料工作情况和当前任
务的报告(1986年3月24日在政协第六
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杨成武(1)
- (2) 邕江革命浪潮澎湃(一)……………李 华(8)
- (3) 蒲庙的沦陷与光复……………周 智(22)
- (4) 击毙反动乡长黄植三……………李孙派、阮文伟、李俊(28)
- (5) 侬智高的历史地位应该肯定
……………谈 琪(30)
- (6) 天地会、大成军和太平军在邕宁地区
的斗争……………苏 文(46)
- (7) 唐光天烈士传略……………雷树增(67)
- (8) 邕宁县革命烈士英名录……………县民政局提供资料(80)
- (9) 邕宁县是古人类活动频繁的地区
——三个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概况
……………卢定山(85)
- (10) 邕宁县的历史概貌(续三)……………杨 培(93)
- (11) 古战场昆仑关(四)……………覃锦吉(108)
- (12) 《邕宁文史资料》征稿启事
……………政协邕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13)

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关于文史资料工作情况 和当前任务的报告

(1986年3月21日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杨 成 武

主席、各位副主席、各位委员：

文史资料工作是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在政协总的工作任务中，作出自己的贡献。就此机会，我代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向各位委员汇报一下自一九八三年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以来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情况，以及当前的任务。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自一九五九年周恩来同志倡导以来，已经有二十七年历史了，本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是在历届委员会卓有成效的工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目前，全国各级政协绝大多数已建立了文史资料工作机构，工作队伍不断扩大，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而稳定的文史资料工作体系。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级政协征集的文史资料已近五亿

字；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有二百余种，专题史料近百种。现在每年出版的文史书刊达百种左右。就全国政协而言，已出版各类文史资料书刊一百八十三种（其中《文史资料选辑》已出至一百零五辑，并从一百零一辑起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共计约三千二百万字。这些为数可观的出版物，集纳了我国近现代史上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书档案之不足，为我国史料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政协文史资料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它是当代人写当代事，是历史见证人亲历、亲见、亲闻的实录，具有翔实的资料性和可读性；同时还具有为统一战线服务的鲜明的政治性。多年来它深受社会各界人士的欢迎。有些海外人士把我们的文史书刊视为珍品，说“这是海外难得见到的好书！”不少海外学者和大学图书馆不断向我们索取书刊；台湾有的刊物也不时转载我们的资料，有的书还被翻印出版，在文史资料方面实际上已起到了一定的交流作用。我们欢迎台湾同行们继续同我们发展这种关系。

三年来的实践证明，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提出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我们进一步克服“左”的思想影响，开阔了视野，扩大了征集面。在近现代史上，凡是参加过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对国家民族作出过重要贡献，或在学术上、事业上有过重要建树的人物，我们都积极去征集他们的史料，这就使征集工作步入了广阔的天地。

为了配合重要的纪念活动和应民主党派的要求，我们与各有关党派和地方合作，及时编印了徐悲鸿、杨虎诚、陈嘉庚、邓宝珊、邓演达、张治中、傅作义、卫立煌、马叙伦、

2.

黄炎培、李济深、邵力子等人和黄埔军校的专题历史资料或画册、文集。这些资料从各人不同的经历，展示了时代的风云，反映了他们爱国思想发展的历程，记录了国共两党两次合作和两次分裂的经验教训。这些专题材料，不但扩大了纪念活动的影响，而且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信条：一个人，只要对国家民族做过好事，人民就不会忘记他，共产党就不会忘记他。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关于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只要爱国就团结起来的一贯主张。习仲勋同志在张治中先生九十诞辰纪念会上说：“文白先生的《回忆录》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如果在台湾的国民党人也能读一读这本书，将会得到启迪和教育。”特别要提到的是，去年纪念抗日战争四十周年，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协征集和编印了抗战史料专辑。全国政协也正在编印一套名为《原国民党将领抗战亲历记》丛书。这些史料专辑配合有关方面反映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情况，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国民党战场的实况和作用。我们这种尊重历史的态度，受到海内外爱国人士的赞赏。对于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一些海外侨胞看到我们的文史资料刊登了他们先辈的爱国事迹，感到祖国无限温暖，更加激发了他们心向祖国的赤子心情，许多人真诚地表示，他们将随时为国出力。

在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下，我们遵循周恩来同志关于整理史料“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努力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反映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既不任意贬低，也不任意拔高。并且采取“质疑、补充、订正”等办法，让知情人和广大读者帮助核实材料。我们认为只有真实的史料，才有说服力，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也才能作为历史财富留给后代。

为了能以较快的速度实现文史资料的系统化、专题化，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于一九八四年在太原召开了政协全国第一次文史办公室主任会议，专题讨论了文史资料大协作的问题。那次会上，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工作部门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商定了三十多个协作专题。现在已陆续发稿出书，预计明年可以全部完成。协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也是全国文史资料体系的优势，我们应当充分发挥这个优势，进一步完善各类不同范围和内容的协作，更有效地开创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局面。

随着文史资料的发展，文史出版物的增多，提高质量的问题已日益突出。在政协六届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邓颖超主席提出：文史资料在增加数量的同时，要注意提高质量。这个指示非常适时，也很中肯。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对此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文史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是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依据，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因此必须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绝不能滥竽充数；更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热衷于猎奇，搞低级趣味去迎合社会上某些人的口味；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已经开创的新局面搞得更加扎实。为了保证质量，文史办公室（出版社）的同志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诸如：对“文革”前存稿重新审核，剔除其中“左”的痕迹；努力发掘新的高质量稿源；实行精选精编，严格把好“三关”（政治关、史实关、文字关）；提高编辑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等。当然，提高质量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单靠我们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们热切希望各界阅历丰富的老同志和专家们不吝赐教，帮助我们改进工作。

各位委员，下面我想再简要汇报一下文史资料工作当前

的任务。

胡耀邦同志今年一月九日在中央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在继续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把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两件大事抓好，抓出个眉目来，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各方面都能够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应当服从于和服务于新时期的总任务和总目标，为此，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着重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文史资料工作应当努力为“两个文明建设”多作贡献。

政协文史资料可以帮助人们认识旧社会的腐败没落，新中国诞生的必然；可以帮助青年认识反动派如何丧权辱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族统一战线如何爱国救国，从而树立起坚定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我们的青年文史读物《纵横》，去年被《北京晚报》评为优秀杂志，颇受读者欢迎，今后应当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它文史出版物也应当把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列为编辑工作的要旨。

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这一经济改革方针的需要，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工作部门应当加紧征集工商经济界老年人士有关外贸、金融、中外合资等方面的史料，他们的经验可为我们的四化建设提供借鉴，使我们少走弯路。我们在安排征集、出版计划时，要充分考虑这方面的专题。

（二）要切实做好史料的“抢救”工作。

一九五九年周恩来同志召集政协委员中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开座谈会，号召他们“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

许多同志响应周恩来同志的号召，提供了很有史料价值的回忆录史料，有的同志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来得及写。现在二十七年过去了，这些同志大都年届耄耋，史料“抢救”是刻不容缓。在这里，我们热切吁请：各位政协领导同志；各民主党派的领导同志，政协常委和委员中年事已高的同志，请你们在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把自己所经历过的近代风云写给我们。如果本人动笔有困难，我们可以派人记录整理。这是历史的需要，也是时代的要求，这和“为个人树碑立传”毫无相同之处。我们希望各级政协、各民主党派和我们一起，逐人落实这项工作。

（三）积极稳步开展港澳台及海外的征集工作。

开展港澳台及海外的史料征集工作，是文史资料工作的新领域、新课题，也是开展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渠道。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特别是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协议的签订，广大海外侨胞和港澳台胞对祖国的向心力空前增强，为我们开展海外征集工作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我们应当采取积极稳步的方针，协同各有关部门，采取各种渠道、各种方式，有计划有领导地把这项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我们希望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的朋友们，利用你们的海外关系和影响，积极协助我们征集稿件。同时，也希望海外各界人士踊跃为我们撰稿，为祖国的史料宝库增添海外之页。

（四）加强文史资料的基本建设。

随着形势的发展，文史资料工作的任务也越来越繁重。为此，必须加强文史资料工作部门的基本建设。我们认为要加强四个方面的建设：（1）建立必要的文史资料征集网；

(2)建立文史书刊发行网；(3)建立一支好的文史工作队伍；(4)全国政协要创造条件建设一个印刷厂。这项基本建设搞好了，将有助于进一步开创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局面。

地方政协文史资料工作部门也有基本建设问题，他们共同存在的问题是：编制少、任务重；经费短缺，出书和发行都很困难等等，希望各地政协加强对文史资料工作的领导，统筹安排，因时因地制宜予以解决。

各位委员，二十七年前周恩来同志倡导的文史资料工作，今天已经结下硕果，这是值得我们为之振奋的。但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文史资料研究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解决。希望各位委员对我们的工作多加批判和指导，并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帮助。

邕江革命浪潮澎湃(一)

李 华

一九四九年初，中共南宁特支研究决定：为了配合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除加强城区工作外，还要迅速向市区外围的农村开展工作，发动广大农民，大搞武装斗争，建立农村小块根据地或游击区。这样，不但给我党市区工作扩大广阔的回旋余地，而且可使南宁市与左、右江，以及十万大山等游击区联结起来，真正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为解放南宁，解放全广西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当时党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对解放南宁起了重要的作用和应有的作用。）特支随即指派谢以平、黄照晖两同志四大塘、那陈，会同周学全等同志，负责开展南区的工作，又派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东区工作过的黄芳同志，到那莲一带了解情况，为开展东区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到了一九四九年春初，特支先后派李华、徐林、马斯、陈叔等同志到东区，和黄芳同志一起，负责开展东区的工作。特支组委谢以平又和雷炳汉、韦有兴、潘馨比同志到坛洛、那龙等地开辟西北区。后来，特支决定在苏圩、吴圩一带成立迁龙区，调马斯同志前往任该区区委书记。于是，整个南宁市区外围的广大农村，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工作就全面开展起来了。

八尺江畔红旗扬

东区，在当时是南宁市以东的地带，包括原邕宁县的八尺区、金城区、吴圩、苏圩以及与此毗邻的横县、灵山边缘乡村，幅员是相当辽阔的。实际是以八尺江两岸为主要活动地区，而后逐步向外扩展。

东区在历史上是有过革命的光荣传统的，早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党曾派人到过东区活动，成立农民协会，乡村苏维埃。一九四九年三月初，我到吴圩七坡村工作时，见到了大革命时幸存的苏伯权同志，当时他已六十多岁，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以及生活上的贫困，已是病弱得很，但精神上却还保持大革命时的革命豪情壮志，不减当年。他和我们谈起工农政权的威风，该地农会领导农民打土豪分土地的革命生动故事，当他讲到大革命失败，不少先烈光荣牺牲时，大家都感动得热泪盈眶。苏老说：“革命受挫折后，我们还是相信党，相信总有一天革命会胜利，共产主义是一定要实现的。数十年来我盼星星盼月亮，盼望共产党回来，如今党终于回来了，胜利的日子快到了，我虽年老，还要参加农会，他们后生（指当晚一起座谈的苏行、苏海、苏永环等同志）跟着党和反动派斗，为革命先烈报仇。”老人一席话，深深的铭记在我的脑海里。因为七坡在敌伪吴圩乡公所的控制之下，为了这次秘密座谈会的安全，七坡村十多个青壮年，主动站岗放哨。这一切，使我亲眼看见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坚强的斗志，大大的鼓舞了党在东区放手开展工作，增强了领导农民大搞武装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曾派过黄孙、唐健、康浪平、张声

震、黄芳、朱玉琨等同志到东区来，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工作，领导和发动当地的抗日武装（那莲、刘圩等抗日游击队等）打击日本侵略者，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保家卫国的斗争。其间，虽也发生过“一·一五”事件及陈高和叛变，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和破坏，党的负责人康浪平同志惨遭杀害。使党受到重大损失，党的工作也一时中断。还有乌兰村的玉桂兴等八个农民也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但这里的农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有着深仇大恨，无论阶级矛盾，政治矛盾都是十分尖锐的。随着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影响，人心向党，人心思变，广大人民群众闹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热情已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我们一到东区，区委几个同志，就日以继夜地开展作，所到村、坡，少的十人八人，多的有一、二十人的基本群众，秘密聚集等候我们，要求给他们讲革命道理，讲解放战争形势，要求帮他们组织起来，参加农会，参加武工队，反对“三征”、闹翻身，求解放。有的村坡主动派武装接我们去。有时一个晚上转几个村坡。因此，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就先后组织了三十多个反“三征”的村坡农会，会员将近千人，遍及那莲、良庆、那马、吴圩以及灵山边境各个山村。并以农会青年骨干会员组织武工队，队员约一百五十多人（以后曾发展到三百多人），当时掌握的武器有轻机四挺，步枪一百多枝，短枪十多枝。星火燎原，革命的火焰熊熊于八尺江畔。

深入开展“反三征”

中共南宁特支，在开始部署农村工作时，就着重指出：必

须从“反三征”——(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征粮、征税、征兵)入手,发动群众不给反动政府纳一斤粮交一分税,不给反动派当炮灰。一方面组织秘密农会,有组织有领导的发动农民抗粮抗税抗征兵。二方面在条件成熟的乡村(如良庆、那莲),通过他们所谓的“民选”乡村伪政权的时机,建立两面政权,由我们推荐地方开明绅士或进步人士或指定我们的人参加竞选。如开明绅士韦庆宾选上良庆乡长,张星煊选上那莲乡长,周锡友、黄有杭、玉桂芳父亲玉××分别选上新丁、平乐、乌兰村长等,并派周智插入那莲乡公所为文书,以与反动政府周旋,间接或直接的进行“反三征”活动。此一时期,可能是我农会的威力和统战工作的作用,加之反动政府的警税人员,也目睹他们打内战的失利,末日即将来临,除龟缩在南宁以及苏圩、蒲庙、那马等圩镇内,不曾发现有警税兵丁到我们群众村来催粮逼税拉丁的。通过反“三征”,人民群众免除了长期来的苛捐杂税的勒索,许多外出逃避“征兵”的青壮年回家来了,不敢露面的“逃兵”也抬起头,情绪高涨,纷纷要求参加农会,参加武工队。三、献粮渡荒。在全面开展“反三征”以后,虽然减轻了人民群众的一些负担,但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压迫、敲诈勒索,和长期受地主恶霸的剥削、欺凌。广大的贫苦农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每年的四、五月青黄不接的季节,大都是糠菜为粮,鬻儿卖女,饥饿致死亦时有所闻。东区的基点村——乌兰,孩子不来上学了,有的武工队员也因奔波生活,不能跟随我们活动了,机枪手玉瑞芳一家五口,饿病在床。区委研究认为:面对当前农民的疾苦,不设法解决,就会给我们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于是决定由农会出面,共产党员带头,动员富户献

粮、借粮，帮助贫苦农民度荒。我记得当时家中较富的周忠张仕俊等党员都带头献粮，动员得蒋美村的梁世藩献粮五千余斤，坛泽村的张星煊（张仕俊父亲）献粮两千余斤，那岳村黄荣春献粮一千多斤，其他中小富户，有三百、五百、或一百、两百斤的，大约十多天的时间，共献出的粮食达三万多斤，由各村、坡农会直接赈济给当地的困难贫苦农民度荒。此举深得人心，农会的威信提高了，武工队也得到相应的巩固和发展。四方面是惩罚“反三征”的破坏者，苏圩是邕宁县较大的圩镇，是反动政府苛捐杂税的大头，稽征主任黎正雄敲诈勒索了不少民脂民膏，稽征人员横行圩市，作威作福，鱼肉百姓群众非常痛恨。我们决定严惩黎某，教训教训敌伪稽征人员，打击一下反动政府苛捐杂税的嚣张气焰。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的一个圩，派乌兰武工队王美卿等十余人，化装小商贩赶圩。入夜十时左右攻入苏圩稽征所，时稽征所仅黎正雄夫妇，毫无防范，突如其来，吓得跪倒求饶。我武工队当即没收他贪污勒索得来的洋纱二十捆，训斥他一顿后，留下一张告示，大意是“令尔贪官污吏，勿再敲诈勒索，鱼肉乡民者，不得好下场”，署名共产党武工队。随即星夜撤回乌兰，缴获大部物资换成粮食分给乌兰贫苦农民度荒。事后据了解，苏圩伪稽征主任黎某，系伪县长的亲信，肚痛心知，秘不“发表”，找其他借口把黎调走。但从此苏圩一带的伪稽征人员，已不敢再似从前那么疯狂放肆了。

邕江支队

一九四九年五月初，中共南宁特支召开紧急会议，地点在市郊葛麻村谢以平同志家，这就是第一次葛麻会议。参加会议

的有苏仁山、梁增瑜、谢以平、黄照晖、李华、雷炳汉、潘馨比等七同志。会议由特支书记苏仁山同志主持，开了一昼夜。特支领导听取各区汇报农村工作开展顺利，武装斗争发展的大好形势时非常鼓舞。结合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以及上级党的指示，会议严肃认真的讨论研究了如何进一步开展农村工作，放手大搞武装斗争的问题。一致认为：为了配合解放战争的胜利到来，为了加强对分散的武工队的领导和指挥，以适应广大人民群众武装起来打击敌人，早日获得解放的要求，为了威慑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军警敌特，有利展开对敌政治攻势，必须有领导、有组织的放手开展武装斗争。同时会议还根据各区已组织起来的武工队的实际武装条件，并考虑到我们面对的是桂系军阀的老巢重镇南宁。遵照毛主席的军事指导思想和原则，反复研究了武装斗争的组织形式。所谓有实有虚，实虚结合，声势浩大不是虚张声势，既敢于对敌公开进行武装斗争，就不能畏缩示弱。因此，特支最后决定成立邕江支队，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邕江支队，各区武工队分别组成团，团的番号也打破从一的序列，而从十开始，决定东区成立第十团，南区成立第十一团，西北区为第十二团；随后苏圩区（原称迁龙区）成立独立大队，借以迷惑敌人，使其弄不清我们武装力量的实情。支队以苏仁山同志为司令员，梁增瑜同志为政治委员。特支并决定任命李华为第十团团长兼政委，黄照晖为第十一团团长兼政委，潘馨比和雷炳汉分别为第十二团的团长和政委。特支在会上对开展武装斗争作了重要指示：一、坚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基本军事原则。二、深入开展“反三征”，壮大农会组织，在农会里建立武装，保证武装的纯洁性，斗争性。三、分

鼓以发动群众，必要时集中打击敌人。四、考虑形势和地理条件的特殊，不采取大规模武装暴动形式，也不宜急于攻城陷镇。五、反对走“土匪”路线。

会议结束已过凌晨，与会同志立即离葛麻，星夜赶回去传达贯彻会议决议。

东区区委听我汇报会议情况后，决定召开区委扩大会议来贯彻葛麻会议决议。当同志们听到成立邕江支队的时候，群情振奋，一致表示坚决拥护特支这一重大决策，纷纷要求把自己的武工队纳入支队的建制。自从第十团宣告成立以后，大大地推动了东区的各项工作。当地不少的开明士绅如蒋美的梁世藩，新丁的陈应佑，那降的黄启才，那岳的黄××等人，主动把私有的武器献给武工队。那莲、良庆两个乡公所，也主动将其武器列单报给团部，我们决定把那莲乡公所的两支手枪没收为团部使用，其中快制驳配给周忠，四集驳配给李华使用，其余留在乡公所听候调用。还有邕江北岸砧板的土匪头子黄增礼，当时号称拥有匪、枪四百，曾多次派人来要求投诚起义，接受改编。我们按照特支“反对走土匪路线”的指示，拒绝他们的投诚受编的要求，但严肃告诫他们：要严守中立，不可再为匪危害人民。

邕江支队的成立，对敌人震动很大，伪专员李画新，伪县长肖抱愚获悉后十分惶恐，加强警特防范，在南宁市内实行宵禁，并从横县调回莫蛟保安团主力增防城区。伪民国副司令李超同率所部数百人，围剿我南区游击区，被我十一团在南忠乡击溃，李超同被我军当场击毙。我军军威大振，敌军政人员更感“危机四伏”，惶惶不可终日，伪专员及伪县长曾数度换马，以图使用莫蛟等一些顽固分子亡命之徒来支掌

残局、作困兽斗。

整 风 学 习

我邕江支队第十团宣告成立以后，继续深入“反三征”，扩大农会组织，并着重加强对武工队的壮大和巩固的整顿。区委分工我留在那莲和邕灵边境负责全面，黄芳同志到捻水负责良庆一带工作，徐林同志到那马一带开展工作。工作进展很顺利，后来发现有个别同志对我党开展武装斗争缺乏正确的认识，说什么“人不离枪，枪不离乡”，不同意武工队到外地游击活动，惟恐人枪调完，无法应付围剿之敌的保家保乡的片面错误思想。特支对这些思想反映很重视，苏仁山、谢以平两位负责同志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亲到东区，在乌兰村召集党员学习整风，历时一天，通过学习整风文献、古田会议等有关文件，提高党员对党的基本知识，提高对党的军事路线的认识，并结合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康浪平同志被害事件的沉痛教训，分析批判了“人不离枪，枪不离乡”的片面性及错误思想的危害，使每个党员认识到只能是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武工队分散必须活动概练，提高素质，才能更有效的打击来犯之敌，认识到我们的武装是党领导的武装，必须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战，为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战。不能停留在抗战时期光为保家卫国的思想上。这个整风会，基本是成功的，绝大多数党员同志的觉悟和认识，得到了提高。对部队素质的提高，战斗力的增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会后，立即在乌兰小学右侧的小房里，举行共产党员入党宣誓仪式，由特支书记苏仁山同志主持，到会每个共产党

员，在毛主席肖像前，逐个举行入党宣誓。

这次会议，不但端正了我们搞武装斗争的思想路线，而且也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的会议。

军事学习班

第十团成立以后，为了加强各武工队的战斗素质和战斗力，曾于一九四九年六月初，借灵山县属那降村黄启才的房子，举办了一期军事学习班，由李平、徐林两同志主办，为期十天。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政治思想方面：一是引导诉苦，提高学员的阶级觉悟。二是讲形势鼓士气，军事方面是讲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结合解放军及各地解放区、游击区人民对敌斗争的生动事迹。教唱了国际歌和游击队歌等歌曲。我记得当时参加这一期学习班的学员是那莲、良庆、那马等各武工队逃送来的骨干如玉桂芳、玉美卿、陈应茂、潘敬甫、梁显祥等共十七、八人。

《战报》及其他

为了把对敌政治攻势搞得有声有色，经支队领导同意，第十团于一九四九年五月间，即十团成立伊始，出版不定期的八开油印刊物——战报，由当时的东区宣委兼十团政治部主任马斯同志主编，实际上除我和其他同志偶尔写一、二篇文章刊登外，大都是由马斯同志自写、自编、自刻、自印的。《战报》的主要内容：有反“三征”情况，有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有转载党及解放军宣传品中有关党中央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文告，有时也在《战报》里发表一些忠告或警告国民党反动派军政官员书及致国民党军士兵公开信等。只是限于印